



闽学研究

十年系

MINXUE YANJIU  
SHINIAN LU

黎昕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闽学研究十年系

黎昕 主编

MINXUE YANJIU  
SHINIAN LU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学研究十年录/黎昕主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211-07108-1

I. ①闽… II. ①黎… III. ①朱熹(1130~1200)—理学—文集  
IV. ①B244.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2034 号

## 闽学研究十年录

MINXUE YANJIU SHINIAN LU

主 编：黎 昝

责任编辑：江叔维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mailto:fjpph7211@126.com)

微 博：<http://weibo.com/fjpph>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 19 号楼 邮政编码：350002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3

字 数：383 千字

版 次：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108-1

定 价：8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前　言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福建有史以来最具国际影响的历史人物。因朱熹长期在福建讲学，且其弟子多为福建人，所以由他所创立的学派世称“闽学”。

朱熹一生穷研孔孟之道，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把自然、社会、人生等各方面融入其思想体系，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的“理先气后”“心统性情”等一系列思想理论在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整个民族完成了一次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

不仅如此，自元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指定科举教材以来，朱子学成为元明清三代的正统思想；后世思想家尽管对朱子学有批评、有修正，但在体系创新上都没有超出朱熹理学体系的范畴。朱学不仅受到中国统治者的推崇，而且远播海外，成为东亚、东南亚等很多国家的重要思想学说，甚至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即便在近现代中西文化掀起冲突和碰撞的背景之下，朱学思想仍旧受到海内外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的持续关注，仍然是当代国际学术界、文化思想界的重要议题。朱熹出生于福建，主要活动范围也在福建，其创立的学说被称为闽学，但其影响范围绝不限于福建省，而是面向世界。朱熹及其闽学不仅影响了中国思想史，而且对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多层面产生了影响。

朱熹的许多思想对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如朱熹所说的“理一分殊”要求正视宇宙万物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这对解决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有一定的启发。理一分殊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不能搞一刀切，应该求同存异，正视差异性。居敬存养的工夫论对于解决由个人空虚、怨愤所造成社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居敬存养要求“主一无适”，做事情专一，还要求心存敬畏。心中有“敬”，精神就会充实，避免因空虚无聊导致危害社会的行为。朱熹对理欲关系的基本看法是要求把个人的感性情欲制约于社会道德规范之中，强调用道德理性限制个人的利己行为，这种以理规范欲的观点对当下物欲横流、道德失范现象严重的社会现实具有

一定纠正作用。除了理学观点外，朱熹还归纳出很多有效的读书法，还有书院的学规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朱熹和閑学研究一直为福建学术界所关注。上世纪 30 年代，福建文化研究会曾探讨过福建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80 年代，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思想的指导下，朱熹和閑学成为福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1990 年 8 月，福建省閑学研究会成立，挂靠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其基本宗旨是：运用多种形式开展閑学理论研究，面向实际探索閑学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系，积极建言献策；深入开展对朱熹学说及历代閑学代表人物的学术研究；收集閑学历史资料和文物；与港、澳、台学者及国际学术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为打造福建文化品牌、提升福建文化软实力做贡献。

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动閑学研究，开展了大量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多次主办有关閑学的学术研讨会，近年来还与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安徽省朱子学研究会和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形成了轮流举办“海峡两岸朱子学研讨会”的机制。同时，我会会员还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高层次的刊物上发表有关閑学理论研究的论文，在海峡两岸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閑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书就是最近十年来在福建省閑学研究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部分论文的结集。

相比于朱熹和閑学思想对中国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贡献，对朱熹和閑学的研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朱熹和閑学思想既是理解福建文化与中华文化内在紧密联系的纽带，也为当下福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驱动。因此，我们应将朱熹和閑学的文化资源与学术研究纳入福建文化品牌的整体架构中，借助朱熹的名人效应与历史影响，推动福建文化在国际学术界、文化思想界的传播。同时积极探索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文化发展的内涵与品质，重树福建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中的自信与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朱熹和閑学思想的地位和影响，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提升福建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把朱子文化打造成国家级、世界级的文化品牌。

# 目 录

论朱熹的释义学 .....	张汝伦	(001)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伦理论 .....	李承贵 赖 虹	(018)
朱子学在中华文化史上的价值和作用 .....	高令印	(031)
朱熹与南剑三先生 .....	何乃川	(034)
当代海外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 .....	黎 昝 赵妍妍	(040)
论朱熹的仁学思想 .....	魏义霞	(056)
李约瑟对朱子学的理性眷注 .....	徐 刚	(065)
朱熹思想在现代台湾之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 .....	张文彪	(072)
重建家族制度与鬼神信仰		
——论朱熹的理学鬼神观及其实践意义 .....	傅小凡	(080)
从《论语序说》看《论语集注》在解释重心上的转变 .....	周元侠	(089)
朱子的心性之学及其理论问题简论 .....	杨少涵	(094)
论朱子学派与福建慈善事业传统 .....	徐晓望	(114)
颜元对朱子学批判述评 .....	张体云	(122)
试论朱熹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	余龙生 徐恩火	(126)
略论朱熹“居敬穷理”的工夫修养论 .....	王国良 秦皖新	(133)
论朱熹的敬畏伦理思想 .....	郭淑新 瞿 宏	(138)
论朱熹的伦理学与后伦理学之别 .....	赵妙法	(147)
试论朱熹的生死关切 .....	方旭东	(157)
朱熹理欲观新释 .....	韩东屏 潘红霞	(167)
朱熹宗教观探析 .....	张 进	(173)
即气论仁——朱子仁学思想的精神特质 .....	田智忠	(182)
陈紫峰与朱熹理学 .....	翁梯敏	(191)
对朱熹蒙学教育思想的现代思考 .....	陈利华	(197)
李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高令印	(203)

《延平答问》与李侗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 .....	陈遵沂	(215)
《延平答问》与朱熹思想嬗变 .....	陈国代	(219)
李侗“静中气象”与为学工夫 .....	罗小平	(227)
师承与“心法”:以《延平答问》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兼论明清之际朱子学的地位 .....	胡泉雨	(234)
逃禅归儒,弃文崇道 ——李侗对朱熹早年思想的影响 .....	冯会明	(241)
李侗“洒落气象”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	兰宗荣	(249)
论李侗对朱熹四书学的影响 .....	周元侠	(256)
李侗在朱熹弃佛崇儒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	李永杰	(271)
朱熹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与武夷山区域文化 .....	徐心希	(277)
朱熹在武夷山著述考 .....	方彦寿	(285)
朱熹论君子贤圣与道德伦理 .....	高令印	(298)
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 .....	朱人求	(309)
主体与心性 ——朱熹主体本体论初探 .....	傅小凡	(318)
朱熹法律起源思想论 .....	徐公喜 王卫红	(328)
从朱熹的“格物致知”到“科学” .....	乐爱国 周翔	(334)
朱熹与摩尼教新探 .....	林振礼	(342)
朱子理学对法国启蒙思潮的影响 .....	张品端	(355)

# 论朱熹的释义学

张汝伦

自从西方释义学（Hermeneutics<sup>①</sup>）思想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就陆续有人提出创建中国的释义学的问题。<sup>②</sup>然而，释义学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思想方式，在中国早已存在，早已被创建；<sup>③</sup>在有些重要的思想家如朱熹那里，还表现得相当系统；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述而不作”的孔夫子开始，它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并不是创建中国的释义学，而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释义学，让它在这个旧邦新命的关头焕发出沉睡已久的活力，使我们得以看清自己的历史与未来。本文的目的就是本着这一认识，对朱子的释义学思想做一番粗浅的疏理，以在

---

① Hermeneutics 一词在我国有释义学、解释学、阐释学、诠释学等多种译法。后三种译法只有一字不同，并无太大差别。根据西方一般专业工具书对 hermeneutics 的定义即“解释的艺术”，这三种译法都是对的。然而，hermeneutics 作为近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解释理论（这是根据狄尔泰的看法，cf. 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orks*, vol. 4,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udolf A. Makkreel and Frithjof Rod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它的目标不仅是文本的疏通，而且是对意义的阐发，并通过这种阐发丰富和壮大人类的历史生命；因为意义不是主观外加给事物的东西，而恰恰是事物本身在人类的历史世界中不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释义学哲学家就不再把释义学视为狭义的方法论。我之所以坚持将 hermeneutics 译为“释义学”，有两个考虑：一是为了突出“意义”概念。“意义”概念是现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不懂这个概念的基本重要性，就无法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精神；但它似乎始终没有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况且，无论是理解还是解释，都是围绕意义进行的，对意义的探究是一切理解和解释的根本动力。二是为了避免人们误以为 hermeneutics 是纯粹的方法论；这种误解在谈论 hermeneutics 的人中很常见。

② 如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 13 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成中英主编《本体论诠释学》，三联书店 2000。

③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本土释义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足以说明这一点，见李清良《中国阐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潘德荣《文字·诠释·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这宏大的事业中迈出小小的第一步。

## —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要论博大精深，朱熹是孔子以后第一人。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史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作为理学最主要代表人物的朱熹，却“常是引据前人文字加以讲论，极少自立文字，自出意见也”<sup>①</sup>。2002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27 卷本《朱子全书》中（最后一卷辑录的是有关朱熹的资料），真正是朱子自己的著述的不过 7 卷多一点，即第 12 卷《八朝名臣言行录》和《伊洛渊源录》，第 20—25 卷《朱文公文集》及第 26 卷《朱子佚文辑录》中的《训蒙绝句》《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和《朱子遗集》。其余除了《通鉴纲目》以及《近思录》这类与别人合作的著作外，大都是他对前人思想的释义和阐发。《朱子语类》（5 卷）是朱熹的讲学语录的记录，其中大量内容涉及对古代典籍的释义或阐释。这些是从量的方面说。从质的方面说，他的释义学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使北宋理学获得论定，归于一是，以上承孔孟义理传统”，“朱子乃集宋儒理学与自汉以下经学之大成而缩于一身，而集注则其最高之结晶品也”。<sup>②</sup>由此可见，释义学不是我们可以从朱熹那里索隐钩沉出来的潜在因素，也不是我们为了证明中国有释义学刻意从他那里“阐释”出来的东西；而就是他惯常的思想方式和表现思想的方式。因此，研究朱熹的释义学，应该成为朱熹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朱子的释义学，已陆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美国学者 John Berthrong 1991 年在英文的《中国哲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捉贼：朱熹（1130—1200）和释义学艺术》的论文。<sup>③</sup> 他根据伽达默尔在《美学与释义学》一文中对释义学的定义，对朱熹的释义学思想做了初步的研究。伽达默尔在《美学与释义学》中是这样来定义释义学的：“……释义学是通过我们自己努力解释我们在传统中遇到的人物之所说来澄清和传达的艺术。”<sup>④</sup> Berthrong 认为，根据伽达默尔对释义学的定义，很容易认定朱熹是释义学哲

<sup>①②</sup> 钱穆《朱子新学案》中册，巴蜀书社 1986，1212、1371 页。

<sup>③</sup> John Berthrong, “To Catch a Thief: Chu His (1130—1200) and the Hermeneutic Art”,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 (1991), P195—212.

<sup>④</sup> Hans-Georg Gadame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 by David E. Linge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98.

学家。<sup>①</sup>他根据这一认知对朱熹的释义学思想进行了一些论述，尤其是对朱熹释义学的实践特点有比较到位的把握，十分难得。但他主要依据的原始材料是《朱子语类》论读书法的第十、十一两卷。<sup>②</sup>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朱熹讲的读书和读书法不是一般意义的正确地读文本，而是非常类似伽达默尔定义的释义学。<sup>③</sup>我们知道，朱子的读书概念和读书法，的确有一部分内容非常类似伽达默尔定义的释义学，但也有相当多的内容不能说是释义学。如“读书须教首尾贯穿。若一番草草看过，不济事”（《语类》卷 10）<sup>④</sup>，只是一般的读书法，谈不上释义学；“不读书，则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语类》卷 11）之类，则是读书的意义，也不能说是释义学。释义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由于围绕着“读书”来论述朱子的释义学思想，Berthrong 基本上忽略了朱子自己的释义学实践（解经和注经），以及朱子在这些实践中所体现和表达的丰富的释义学思想。Berthrong 正确地将朱子的“读书”理解为格物的一个方面，但他的论文用了近一半的笔墨来交代“格物致知”及其与读书之关系，这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但客观上却削弱了他对朱熹释义学思想的论述。结果，除了对读书与格物的关系的论述外，关于朱熹的释义学思想 Berthrong 一共就讲了四点，即：读者的心与圣人之心可以相通；读书先要“虚心平气”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文本有其次序，不能乱来；承认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鸿沟，有可能导致一些过去的文本根本无法解释。<sup>⑤</sup>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单薄，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相比较而言，潘德荣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上的《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一文，在对朱熹释义学思想的正面论述上，较 Berthrong 的文章远为详细和系统。通过“诠释的根据”“诠释的目的”“诠释的方法”三个部分层层推进式的论述，潘教授很好地梳理和分析了朱子释义学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

与 Berthrong 明显不同的是，潘教授似乎并不认为朱子的有关文本诠释的思想是释义学。他明确拒绝把传统的训诂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讲的释义学（潘教授称为“诠释学”）混为一谈，因为释义学是“研究理解与解释的一般方法”

<sup>①③⑤</sup> John Berthrong, “To Catch a Thief: Chu His (1130–1200) and the Hermeneutic Art”,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 (1991), P195、196、200—206。

<sup>②</sup> 并且这些材料也是从钱穆的《朱子新学案》转引。

<sup>④</sup> 本书中《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作为经典引文出处时，统一简称《语类》《文集》，卷数采用阿拉伯数字形式；作为当代出版物名称时除外。

及其本体论根据的理论体系”<sup>①</sup>。但他没有明确说，为什么朱熹的诠释思想就不是释义学。想来潘教授也一定会同意，朱熹的诠释思想不等于训诂学，虽然他在训诂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与成就。朱子诠释经典固然也不离训诂与考据，但也如他所肯定的汉儒，“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文集》卷 31）。朱子诠释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疏通语句，而是为了弄清义理。按照上引伽达默尔关于释义学的定义，朱子的诠释思想应该如 Berthrong 所主张的，是释义学。在我看来，即使根据潘教授自己在论文开始给出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使用的”（其实是哲学释义学使用的）“诠释学”（即释义学）概念，朱子的诠释思想也可以称为释义学。退一步说，即使朱子的诠释思想不能与潘教授给出的“诠释学”概念的定义完全若合符节，为什么就不能算是“诠释学”即释义学呢？中国古代思想与西方的“哲学”概念有诸多不合之处，并不妨碍人们称其为“哲学”。

也许在潘教授的眼里，朱子的诠释思想只是一种方法论，<sup>②</sup> 而非本体论。严格讲，西方意义上的本体论（ontology）在中国古代不可能有，因为它与西方语言中的系动词 to be 有关，而中文恰恰没有这个系动词，学者至今还在为如何正确翻译 being 这个词而争论不休。<sup>③</sup> 但若就本体论的内容而言，那么朱熹的诠释思想也可以说有其本体论前提或根据。后人为什么能理解往圣，因为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共有同一天理，或者说，他们存在在同一天理层面上，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物理时间段。理解和解释经典文本不是为了得到与自己存在没有切身关系的客观知识，而是要将对经典义理的理解和解释化为自己的人生实践，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因此，朱子的诠释思想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论，它完全符合伽达默尔对释义学的“理解、解释和应用的科学”的规定，<sup>④</sup> Berthrong 对此有正确的把握。潘教授虽然也注意到了朱子诠释思想的实践性，却似乎未能从本体论层面上去理解这种实践性。因此，他基本上是从纯粹方法论的意义上去理解朱熹的诠释思想，也

<sup>①</sup> 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56 页。

<sup>②</sup> 潘教授关于中国诠释传统的大作《文字·诠释·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中关于朱熹那一节的标题就是“朱熹的诠释方法论”，见该书第 78 页。

<sup>③</sup> 关于这一问题可看宋继杰主编的《Being 与西方哲学传统》（上下卷），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sup>④</sup> John Berthrong, “To Catch a Thief : Chu His (1130—1200) and the Hermeneutic Art”, P195.

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不认为朱熹的诠释思想就是诠释学即释义学。

这种对朱熹释义学的纯方法论认识产生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是“体验”的问题。潘教授在其论文中谈到：“宋儒——特别是朱熹——所关心的重点并不是言与意的关系问题，而是读者个人的体验。”“在朱熹看来，没有个人的切身体验是悟不出圣人言语之本旨的。”<sup>①</sup>“体验”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在西方古典释义学中，它是一个和“移情”概念相联系、具有很强的心理学意味的概念。但在朱子那里，却完全不是这样。朱子讲的“体验”绝没有心理学的含义。他的确多次讲到“体验”，如“少看熟读，反复体验”（《语类》卷10）、“读书，须要切已体验”（《语类》卷11），“亲切贴身体验出来，不须向外处求”（《语类》卷20）等，但朱子讲的“体验”是“体玩”的意思（《语类》卷10），即“玩索践履”（《文集》卷44）或“切身体察”（《文集》卷45）的意思。“玩索”“体察”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认知活动，而是有意识的生活经历。圣人在经典中所说之理，“自家合下原有底”，但“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文集》卷10）。因此，“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过来就自家身上推究”（《语类》卷11）。“切身体察”就是按照书中的道理为人行事，也就是“践履”，从而真正把握我们与圣人本来共有的道和理。因此，如果用伽达默尔释义学三要素来套的话，“体验”显然更类似“应用”，而不是“理解”，虽然从根本上说，理解、解释和应用是不可分的。潘教授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朱熹的体验着眼于格物、践履”，<sup>②</sup>但他显然认为体验是一种理解，类似对客观知识的掌握式的理解，因为他认为朱熹的体验“是一种基于闻见之知的经验基础上、之外而内的体验”<sup>③</sup>，而这种理解显然不符合朱子“亲切贴身体验出来，不须向外处求”的说法。另外，潘教授似乎没有完全摆脱对体验的心理学理解。他一方面说体验的理解方法不同于西方心理学诠释中的“心理移情”<sup>④</sup>，另一方面又说体验概念深入到理解的基础——社会生活和心理因素。<sup>⑤</sup>

由于基本上是以方法论来理解朱子的释义学，所以潘教授对朱子诠释的目的的论述也与朱子自己的说法不符。潘教授认为朱子诠释的目的有三个层次：理解经文的原义，或者说把握本文的意义；然后是理解圣人的原意，即理解作者的意图；最后是读者所悟（接受）之义，在原义的基础上有所发挥。<sup>⑥</sup>但朱子

<sup>①②③④⑤⑥</sup> 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59、59、59、63、60、60页。

在给石子重的信中却说：“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文集》卷 42）潘教授说的诠释的三个层次与朱子自己说的三个层次显然有异。在朱子那里，“天地之理”，而不是“读者所悟之义”，才是诠释的根本目的。

由于要达到的是亘古不变的“天地之理”，所以朱熹一贯反对“在原义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在谈到“以意逆志”的时候，朱子说：“此是教人读书之法。自家虚心在这里看他书道理如何来，自家便迎将去。”（《语类》卷 58）他说自己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自直晓会，不敢妄添一句闲杂言语”（《文集》卷 52）。他自我批评说：“学者以玩索践履为先，不当汲汲于著述。既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说又未必是，徒费精力。此区区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愿贤者之为之也。”（《文集》卷 44）他认为：“即所谓高远者，亦不在乎创意立说之间。”（《文集》卷 39）“在原义上有所发挥”在他看来就是“推衍文义”，不啻“屋下架屋”（《文集》卷 31）。正因为如此，他对伊川解经颇有微词，认为有点过了：“圣人说得甚浅，伊川说得太深。圣人所说短，伊川解得长。”（《语类》卷 72）他认为孔子述而不作是“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论语集注》卷 4）。他一生以释义学作为自家的主要工作方式和思想方式，肯定与这些思想有关。

## 二

释义学成为朱熹惯常的思想方式和表现思想的方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出于他对为人为学的根本理解。在他晚年（65 岁时）给宁宗上的《行宫便殿奏札二》中，他对宁宗说：

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伦，制其事物当然之则矣。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知反。必其学以开之，然后有以正心修身而为齐家治国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学，而其所以学者初非记问辞章之谓；……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言所行，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文集》卷 14）

可见，对于朱子来说，人生在世，当以致知穷理为第一要务。而要致知

穷理，则必从“经训史册”求之，因为那里集中了只有古圣先贤才能穷尽的“天下之理”。一般人不可能生而知之，必须通过学，即对经典的研读，日积月累，方能豁然开朗，得窥“天下之理”。学，或者说读书，不是可有可无之事，而是致知穷理必由的途径。“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一个“必”字，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同时代乃至后来的理学家相比，朱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行不悖。尊德性固然是为学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但道问学也不是纯粹的手段，而是尊德性不可无的实现途径。“一切道问学，皆当为尊德性。”<sup>①</sup>我们可以套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话来说明在朱子那里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关系：尊德性无道问学则空；道问学无尊德性则盲。正是尊德性以道问学为实施途径、道问学以尊德性为依归，成就了朱熹在理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地位。朱熹曾告诉别人：“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开明之，此为要切之务。”（《文集》卷47）这实际上就是他为学的基本特点和目标。

朱子采取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立场，不是一时所为，更不是因为朱陆之争，而是他对先秦以来思想学术发展史及现状反思批判的结果。“尝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诵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为陋者。”（《文集》卷75）朱子最疾者，乃当时很多人“坐谈空妙”，放言高论。“盖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处以上智生知之流，视圣贤平日指示学者入德之门至亲切处，例以为钝根小子之学，无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往往为险怪悬绝之言以相高。甚者至于周行却立，瞬目扬眉，内以自欺，外以惑众。此风肆行，日以益甚，使圣贤至诚善诱之教，反为荒幻险薄之资。仁义充塞，甚可惧也。”（《文集》卷38）朱子这里所批评的，不仅是象山一路学者，也包括二程及其后学。<sup>②</sup>可惜朱子虽目光如炬，却未能煞得此风。而后心学不论，即使恪守程朱家法者，大都也同样归于空疏一途，中国传统思想遂走向衰落。

① 钱穆《朱子新学案》上册，105页。

② 有关朱子对程门学风的婉转批评，可看钱穆《朱子新学案》中册，927—933页。

然而在当时，朱子却试图力挽狂澜，坚持下学上达的道路，坚持以读书为教。这就是为什么现存他的文字言论很大一部分与经典释读有关，为什么他毕生要对《四书集注》下那么大的功夫。<sup>①</sup>可以说，经典释义是朱子为学为教的基本手段和途径。因此，朱子在一生为学和讲学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系统的释义学思想，这些本土的释义学思想资源对于希望在现代语境下与往圣先贤进行有效对话的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朱熹自觉地从事经典释义学的工作，乃不得不然。在朱熹的时代，先秦的典籍已是非常难读了，何况在朱熹看来历代的儒生经常强作解人，反而歪曲或蒙蔽了经文的本义。因此，要抉发经文本义，使人看到它们“天下之理”的本然，就必须进行一番释义学的阐释：“经书难读，……经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说杀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见本来开物成务活法。……鄙说正为欲救此弊。”（《文集》卷 43）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对于朱熹来说，“经文本义”不是超越的客观知识，而是“开物成务的活法”。这就意味着释义者不能像一个外语文本的翻译者那样可以自外于它。所以解释不是训诂，<sup>②</sup>虽然解释离不开训诂（此点容专文再论）。解释的目标不是一般的意義，而是我们自己安身立命的义理，天下万世不易之大法。但我们或由于气质有偏，或由于才智不够，或由于刚愎自用，总之，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而与之格格不入。而释义学（朱子的说法是“解经”）就是要通过对经典的解释使得天下之理和天下大法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融贯。因此，“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语类》卷 19）。

可见，对经典的解释和释义是格物致知的基本方式，它的目标是“精粗表里，融会贯通”（《语类》卷 9）。它之所以不是训诂，是因为它并不是要简单地克服文本中的阅读难点和由于时间的推移一般人已经感到陌生的东西，而是要融贯和发挥文本所涵之义理。<sup>③</sup>理是“天下之理”，万物莫不有理，人

<sup>①</sup> 我们从《语类》卷 19 中可以看到，朱熹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六十七八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他在七十一岁临死前一天（钱穆说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正因为下了如此巨大的功夫，朱熹对《四书集注》非常自负，声称“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一字是一字，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

<sup>②</sup> “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论语》须是玩味。”（《语类》卷 19）这句话清楚表明在朱子那里训诂与释义有明确的区别。

<sup>③</sup>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说“朱子的释义学”而不能说“朱子的阐释学”或“朱子的诠释学”或“朱子的解释学”。朱子关心的不是一般的意義如某字某句当作何义讲，他关心的是义理。

也不例外。所以朱子说：“天理在人，亘万古而不泯。恁甚如果蔽固，而天理常自若，无时不自私意中发出，但人不自觉。正如明珠大贝，混杂沙砾中，零零星星逐时出来。但只于这个道理发见处，当下认取，簇合零星，渐成片断。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长月益，则天理自然纯固。”（《语类》卷 117）解读文本不是寻求在自身之外的客观知识，而是通过对文本所涵义理的体认激发自身所涵显豁贯通之理，达到天理一贯、物我一理的境地。

### 三

西方释义学产生于人的历史性局限所造成理解困境，即理解者与理解对象处于不同的时代所必然产生的理解困难。这困难归根结底是因为西方人认为理解对象和理解者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体两分的思维模式加剧了这种差异的根本性。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从存在论角度出发的哲学释义学，虽然超越了主客体的思维模式，但却强化了人的历史性的地位。他们的方案是以人的历史存在来统一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但理解对象与理解者双方的历史性不可通约，这种统一终究有些问题。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最大的问题是：融合后的视域有无历史性？伽达默尔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那么它的历史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理解者的历史性是什么关系？回答只能是：它不可能与理解对象的历史性、理解者的历史性中的任何一个一致，那样的话它就没有融合，它只能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视域融合后的产物。但是如果这个视域现在是理解者和理解对象共有的视域的话，岂不意味着它得以发生和存在的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历史性被它取消了？

朱熹的释义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他来说，理解的困难不是由于理解者（读经者）和理解对象（经书）历史性的差异，<sup>①</sup> 而是理解者气质之偏造成的。理解者与理解对象是先天统一，后天才分裂的。解读（理解）经书就是要克服这种由于个人气质欲望等特殊性造成的分裂，恢复个人（所涵之理）与天理先天的一贯和流畅，用朱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

但这并不等于说朱子看不到人们（包括他自己）在理解古代经典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些知识性、技术性的困难。相反，他自己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他的释义学同样要解决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注疏如何弃得。”

<sup>①</sup> “历史性”概念对于朱熹恐怕不存在。

(《语类》卷 129)“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语类》卷 11)校勘训诂章句文义若不讲求，书就无法贯通，就必然会信口开河，胡说一气。所以他主张“随文释义”(同上)，“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语类》卷 72)。但朱熹并不自我作古，而是尽量利用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他说：“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文集》卷 69)故他的释义学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就利用了许多前人的成果。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前辈解说，恐后学难晓，顾《集注》尽撮其要，已说尽了，不须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说话。只把这个熟看，自然晓得，莫枉费心思去外面思量。”(《语类》卷 19)但他自己并不因此而省略了训诂章句方面的功夫。相反，他自己在这方面用力极深，成就斐然。朱子虽被人目为理学家，但其在传统小学训诂方面的成就比之汉儒抑或清儒都毫不逊色。钱穆曾说：“清儒治经，菲薄宋儒，自号曰汉学，以与宋学划疆界，树门户。然余观朱子治经，其识解之明通，意趣之宏深，既已远超于清儒之上。清儒自负以校勘训诂为能事，然朱子于此诸项，并多精诣，论其成绩，亦决不出清儒之下。”<sup>①</sup>钱穆此言，允为至当。

在西方释义学中，有所谓“释义学循环”，就是要理解整体就要理解部分，要理解部分必须理解整体。这种“释义学循环”在朱熹的释义学中不容易找到；但他有自己的“释义学循环”，这就是义理与训诂的循环：要掌握义理不能没有训诂，但不掌握义理就无法定训诂。朱子的释义学操作就是在这种“释义学循环”中进行的。试举一简单的例子，《语类》卷 72 对《周易》恒卦的解释：“恒是个一条物事彻头彻尾，不是寻常字。古字作惄，其说像一只船两头靠岸，可见彻头彻尾。”这个例子也表明，朱熹的“释义学循环”的两造不是对等的，他总是“以义理定训诂，不以训诂定义理”<sup>②</sup>。这也可以理解，义理是目的，训诂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手段当然要服从目的，由目的来规定。

所以朱子言训诂与清儒言训诂有一显著不同，就是“清儒所谓训诂，旁通之于尔雅说文，以求得此一字之义，而每非此字在书中说特殊含蕴之义理深微所在”<sup>③</sup>，而朱子刚好相反，他总是从义理出发来解字义，“根据义理大节目以辨字义，非明字义以明义理”<sup>④</sup>，非仅凭古注或《尔雅》《说文》，这一点颇似海德格尔对词源学的运用。他最反对目无义理，为训诂而训诂，虽注

<sup>①②③④</sup> 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册，1724、1434、1416、1421 页。